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的演變

doi:10.30390/ISC.199110_30(10).0009

問題與研究, 30(10), 1991

Wenti Yu Yanjiu, 30(10), 1991

作者/Author：畢英賢

頁數/Page：99-11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1/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110_30\(10\).0009](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110_30(10).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的演變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今(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蘇聯突然發生政變，一些強硬派分子軟禁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試圖恢復強制統治，維持蘇聯政體。二十一日，政變失敗，戈巴契夫復權視事，重組政府，解散原有權力結構，組織過渡時期的臨時政權機構(國務委員會、跨共和國經濟委員會及最高蘇維埃)。從此，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所產生的蘇維埃共黨政權，在形式上，已告終結。

在蘇共政權存在的七十多年中，其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恩怨怨難難以釐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蘇聯曾協助國民政府建軍、北伐，也曾軍經援助國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另一方面，蘇共政權一手扶植中國共產黨，軍援中共奪取政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之時，也是中華民國與蘇聯正式關係斷交之日。從此，蘇聯對我國的態度隨著其對中共政權關係的起伏而轉變。五十年代內及六十年代前半期，蘇聯極端敵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六十年代後半期，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莫斯科對我國的態度曾作出了策略性的轉變，對我國表示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興趣，曾引起中共的不滿與國際的猜測。七十年代後半期，當中共與蘇聯依然不和，而中共與美國關係逐漸走向「正常化」之際，曾謠傳蘇聯正考慮「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此，中共發動了猛烈的批評。

自一九八二年起，中共與蘇聯開始了和解的過程。一九八五年後，和解步伐加快，而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完成了「關係正常化」。此時，蘇聯一再重申「一個中國」原則。與此同時，蘇聯以新政治思維為基礎的對外政策和外交行爲也變得靈活、有彈性，而且務實。另一方面，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關係上採取了務實的做法。在這些條件下，中蘇關係開始了新的變化。這個變化還在發展之中。

敵我助中共時期

北平共黨政權成立後，蘇聯率先予以外交承認，廢棄其與我國所簽訂的「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條約」。①事實上，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該條約簽訂後，蘇聯方面並沒有尊重該條約所規定的義務，既沒有遵守尊重他國主權與領土完整原則，也沒有嚴守不干涉他國內部事務原則。②中共佔據中國大陸之初，情勢並不穩定。蘇聯一方面協助中共整頓其武裝力量。使之現代化；另一方面，派遣航空單位到中國大陸，協助中共對付國民政府的空中攻擊。據蘇聯方面的記載，蘇聯航空大隊到達中國華東一帶後，中華民國的空中襲擊就停止了。③

爲了協助建軍，莫斯科不僅把中共軍事幹部接到蘇聯受訓，而且應北平政權的要求派遣軍事專家到大陸去，協助中共練兵。此外，蘇聯給予中共貸款購買蘇聯的軍事裝備。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與蘇聯簽訂了「友好、聯盟與互助條約」。④實際上，雙方之間成立了政治和軍事結盟。這一事實使中共有了較有利的國際環境，從容整頓內部。蘇聯協助中共鞏固其政權後，就展開了兩項對我國極具威脅性的行動：其一是支持中共「解放台灣」；其二是支持中共爭取「在聯合國的權利」，取代我國的代表權。

此時，克里姆林宮一方面譴責美國「以武裝力量侵佔台灣島」，一方面在各種國際場合上宣揚此一觀點。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共向聯合國提出「譴美侵台」案，蘇聯鼎力支持，要求美國軍隊撤離台灣。經由蘇聯代表的提議，中共受邀派代表團赴聯合國，參與此一議案的辯論。但是，譴美案在聯合國並未獲得通過。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我國與美國簽訂台灣協防條約；蘇聯隨即發表一項聲明表示，美國簽訂這個條約違反了美國的國際義務，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直接侵略。其後，在幾次台灣海峽緊張事件中，蘇聯處處偏袒中共，與我爲敵。⑤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共宣稱，有權在聯合國佔一席位。蘇聯首先支持中共的聲明，反指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爲「非法

註① 庫爾久科 (I. F. Kurdyukov)，尼其弗羅夫 (V. N. Nikiforov)，皮瑞費爾泰洛 (A. S. Pereferailo) 等主編，蘇中關係一九一七—一九五七：文獻彙編 (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ya, 1917-1957: Sbornik Dokumentov)，頁一九六—一九八。

註② 同註①，參見條約第五條，頁一九七。

註③ 阿斯塔費耶夫 (G. V. Astafiev)，杜賓斯克 (A. M. Dubinsk) 等著，中共對外政策與國際關係 (Vneshnyaya Politika imezhdunarodnyye otnosheniya KNR, 1949-1963) (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九七四)，卷一頁二。

註④ 同註①，頁二一九—二二〇。

註⑤ 賈丕才 (M. S. Kapitsa)，中共與蘇聯 (莫斯科：政治文獻出版社，一九五八)，頁四〇五—四〇六。

「，堅決排斥我國政府，接納北平政權。蘇聯宣稱，沒有中共的參與，聯合國不可能解決任何重大問題。」^⑥

五十年代內，關於中國在聯合國的會籍問題，大約有三個方案：第一，中共入聯合國並取得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代表權，中華民國僅在聯合國大會內有代表；第二，與前一個方案相反，中華民國仍留在安理會，中共僅在大會內有代表；第三，中華民國與中共皆為聯合國會員國，安理會席位讓給亞洲某一個國家。但是，蘇聯及其集團國家堅持排我納中共。此外，在國際論壇上，蘇聯把美國和我國的協防說成是「美國對台灣的侵略」，並不斷要求美國從台灣撤走武裝力量。^⑦ 依蘇聯與中共的判斷，如果美國力量撤走，中共在蘇聯的支持下，就可輕易「解放台灣」。

在這個時期內，中華民國堅持「反共抗俄」政策。一九五四年六月，蘇聯一艘油輪「陶普斯」(Tuapse)號進入我國領海，被我空軍攔截，海軍將之逼至台灣北部港口，成為我方的俘虜。船上的水手大部分赴美國，或移民他國，或回蘇聯；一部分留在台灣。一九八八年時，尚有四人健在；中華民國政府按照其自願，三名遣返蘇聯，一名留在台灣未歸。^⑧

「魔鬼」在招手

六十年代中期，當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之際，莫斯科對台北的態度出現了轉變的徵候。蘇聯的一些刊物出現了中華民國的國號與國旗。例如，一九六五年擁護世界人民刊物上，出現了我國在奧運會場上飄揚的國旗；一九六六年海外(Za Rubezhom)週刊及塔斯社(TASS)把中華民國台灣以「國家」或「政府」相稱；一九六七年，在蘇聯新書(Novye Knigi, SSSR)的內封面上，印上了中華民國國旗；一九七〇年初，美國副總統安格紐訪問台北，蘇聯新聞報導時，稱我國為「中華民國政府」。^⑨

蘇聯一名記者於一九六八年十月秘密訪問中華民國，引起中共的強烈反應。這名記者假名叫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原名為維塔列·葉夫根葉維契(Vitaly Yevgenyevich)。他是中華民國遷台後，第一位取得中華民國正式簽證的蘇聯公民。據報導，他在台灣訪問期間，曾與當時的中華民國國防部長蔣經國會談。英國星期時報(Sunday Times)指出，路易斯的活動並不像一個普通新聞記者。他本以倫敦晚報(London Times)記者身分訪台，但並未為該報撰寫任何有關

註⑥ 同註⑤，頁三九三。

註⑦ 同註⑤，頁四九。

註⑧ 拉金妮娜(D. Lagina)，赫魯波斯托夫(M. Kurobostov)，「來自地獄的三個人」，新時代(Novoe Vremya)，一九八八年，期三五，頁三〇～三三。

註⑨ 高維爾(J. Garver)，「台灣的俄國選擇：想像與真實」，亞洲觀察(Asian Survey)，一九七八年，七月號，頁七五四～七五五。

此次的訪問報導。^⑩

中共對路易斯的訪華，頗多疑慮。人民日報於次年三月就此事發表評論，刻意誇大其意義；並指責蘇聯，與美國共謀，試圖製造「兩個中國」。^⑪西方記者則認為，路易斯的任務是，在中華民國與蘇聯之間建立某種關係。^⑫據報導，路易斯曾於一九七二年再度來台。關於這件事，西方與日本通訊社皆曾紛紛報導。此外，在華盛頓、東京及渥太華等城市，蘇聯外交人員和新聞人員同中華民國的外交人員和記者進行非正式的接觸。中共曾指出，一九七一年在愛爾蘭首都舉行「國際筆會第三十八屆大會」期間，蘇聯代表與中華民國代表「熱情敘話」，並向中華民國總統問候。

一九七二年三月，蘇聯新時代周刊報導有關中國國民黨中央全會的新聞時寫道：「三月初，國民黨，即台灣的執政黨，舉行中央全體委員會，選舉八十五歲的蔣委員長為第五屆任期六年的『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在最後一天會議中全體九十九位中央委員一致擁護蔣委員長並起立高呼『蔣總裁萬歲！』」^⑬這種方式的報導，不僅令中共不滿，也引起世界輿論的注目。同年六月，外交部長周書楷公開表示，為了國家生存，可以與「魔鬼打交道」，但台北當局顯然未接納此一主張。

一九七三年二月底，北平方面發表對台灣談話，呼籲「祖國統一」、「愈快愈好」；並以感性詞句對台灣人民說，「血濃於水，落葉歸根」。不久，蘇聯新時代發表文章，標題是「台灣：漂浮在大洋上的一片葉」。^⑭這個標題強烈暗示，落葉不易歸根了。該文作者說，在中國地圖上，台灣像一片樹葉，從樹上落下，漂浮在太平洋的水面上，而這個地區的政治風向，正使它遠離中國海岸。

一些美國學者判斷，前述事實足以說明，在六十年代底與七十年代初，也就是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的時期，中華民國與蘇聯之間確實存在著實質關係。^⑮不過，這種關係是非軍事性質的。當時，只有一個事實隱含軍事意義。那就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兩艘蘇聯軍艦通過台灣海峽，並繞台灣環航一週；在時間上，恰好是美國駐北平連絡處主任布魯斯(D. Bruce)到中國大陸就任的前兩天。據報導，這次航行事先曾與中華民國取得聯繫。事實上，蘇聯對台灣的每一個表態與動作，皆未逃過中共的批評。中共指責蘇聯在製造「兩個中國」；莫斯科則辯稱，中共同意美國在北平設立連絡處等於事實上承認兩個中國

註⑩ 包斯倍洛夫斯基(D. Pospelovsky)、「維克多·路易斯的奇異經歷」，自由電台(Radio Sloboda)(慕尼黑)，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期三九九(七〇)，頁二。

註⑪ 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三月六日。

註⑫ 國際先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註⑬ 新時代，一九七二年，期十二，頁七。

註⑭ 新時代，一九七二年，期十九，頁二二—二三。

註⑮ 同註⑨，頁七五七。

的並存。

一場不明顯的「牌局」

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美蘇和解遇阻，北平與莫斯科尚無改善關係的跡象，美國國內關於打「中共牌」的聲音甚囂塵上。實際上，聯共制蘇聯已成爲美國全球戰略的要素之一。蘇聯當局一再表示，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將威脅亞洲的和平。在這種戰略較勁的遊戲中，一場牌局就登場了。表面上，這是中共、蘇聯與美國之間的三角互動關係。實質上，由於中華民國與美國關係密切、與中共相互敵視、與蘇聯又有一種切不斷理還亂的歷史關係，於是中華民國也成爲了「一張牌」。

就地緣政治與戰略觀點論，中華民國台灣可以幫助蘇聯牽制中共，也可以助使其加強在太平洋上的戰略形勢。另一方面，一般國際問題專家也認爲，中華民國若打「蘇聯牌」，可以警告美國，在其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際，不可忽視或出賣中華民國的利益，因爲美國並不是台北方面的「唯一選擇」。當時，國際上流行一種說法：「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那時，蘇聯確實是中華民國的「敵人的敵人」。因此，中蘇間任何風吹草動皆會引起國際輿論及有關方面的注意。例如，一九七六年夏，一名希臘記者訪台後報導說，中華民國準備把澎湖某一基地給蘇聯使用。^⑮從此，流言不斷發生。

當時，台灣社會廣泛談論一本由蘇聯人寫的書：弗拉基米羅夫日記。弗氏是蘇聯「塔斯」通訊社記者，抗日期間爲該社駐延安的通訊員。在這本書中，他對毛澤東及中共組織頗有批評。中共喉舌指稱，這本「蘇製捧蔣」的書，內多謊言。此時蔣夫人在台灣各大報發表「與鮑羅廷談話的回憶」。^⑯中共以此「回憶」文章推演說，這是她對中華民國當局「投靠蘇修的用心」的一記當頭棒喝。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的死亡爲中共與蘇聯關係帶來改善的契機；台北與莫斯科的「關係」再次蟄伏。在一九七七年內，有關中蘇關係的傳聞已不多見。但是，進入一九七八年後，中蘇關係再次成爲熱門話題，而且相當熱。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與美國發表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在雙方宣布建交前，自然有不少相互活動，因此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的發展又成爲世界輿論注視的焦點之一。

一九七八年四月，美國的紐約時報首先報導，中華民國與蘇聯在維也納祕密談判，尋求經濟支援。此時，軍事專家指出

註⑮ 英文中國日報 (China News)，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十二日，頁四。

註⑯ 中國時報，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頁十三、十四。

，蘇聯的亞洲戰略是包圍中共、趕走美國，因此向台灣接近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中共對莫斯科和台北間建立聯繫一事經常表示擔心並發出警告，甚至美國方面的分析家也認為「絕望的台灣可能步越南的後塵」。¹⁸美國報刊大談台灣的「俄羅斯牌」，中華民國却表示「我們不玩牌」。¹⁹在這段時間內，外電傳言，蘇聯考慮承認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似乎曾表示，蘇聯可以利用金門、馬祖蒐集中國大陸的情報。中共「新華社」為此著文指責中華民國「聯合蘇修」、「出賣國家利益」，並圖破壞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²⁰關於前者，台北外交部曾鄭重否認；關於後者，台北的中央日報有專論反駁。

令人訝異的是，蘇共真理報此時發表以「賣國政策」為題的「塔斯社」評論文章。蘇共指出，北平指責台北「出賣國家」，其實北平的對外政策與台北沒有兩樣。台北固然願意成為美國「屏障西部的前哨」，但是，鄧小平也曾贊成把「中國」視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方成員」。「塔斯社」論文說，在敵友問題上，「台北與北京皆忘記，誰是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誰是敵人」。一九七九年秋，傳言蘇聯軍艦在澎湖修護，台北外交部隨即予以否認。當年底，中國國民黨主席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幕時指出，「聯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想法。他說，美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是一個錯誤，如果以「聯俄」相抗衡則所犯的錯誤更大。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共與蘇聯在莫斯科開始了關係正常化談判。於是，關於中華民國與蘇聯之間的種種傳聞也開始冷卻下去。以往，各種傳聞大多查無實據，但也有人認為，並非空穴來風。易言之，台北與莫斯科之間有沒有相互玩牌，很難查證；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中共與美國在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確實曾擔心台北與莫斯科間會採取某些行動；(二)中華民國學者與政府官員之間，曾為此一問題進行辯論；(三)台北與莫斯科方面的一些動作，的確會引起猜測；(四)雙方有沒有玩牌，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顧慮使中共與美國在建立外交關係時，對若干問題更加小心。簡言之，雙方縱無玩牌之實，但已產生玩牌的一些效果。

務實關係的起步

從七十年代起，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放棄了「不是朋友，便是敵人」一刀切的僵硬立場，而認為不是敵人就是朋友。一九

註¹⁸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頁一、十一。

註¹⁹ 例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又如，註⁹；英文中國日報，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頁二。

註²⁰ 大公報 (香港)，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六日，頁一。

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對東德、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捷克五個東歐共黨國家採行直接雙邊貿易；對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阿爾巴尼亞則進行間接貿易。這是中華民國政府首次採取「政治、經貿分離」的政策。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也加入了直接貿易的行列。此時，只有蘇聯和阿爾巴尼亞仍限於間接貿易。實際上，至遲在一九八〇年初，台灣已通過香港一家貿易公司，向蘇聯購買棉花。

從此，台灣各界對蘇聯開始感興趣。中華民國政府來台之初，堅定執行「反共抗俄」政策。在七十年代內或更早，「抗俄」已經少見，最後只留下「反共」。例如，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〇年），台北成立了「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十年之後，這個名稱已經改為「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依當時的政治情況與心態看，這類口號或標語的改變決非等閒之舉。易言之，我國政府對蘇聯的態度，從一九六〇年末期起已開始轉變。不過，中蘇關係的突破仍有待國際情勢和蘇聯對外政策的劇變。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成爲蘇聯政治體制的最高領袖，內部進行改造、公開性及民主化政策，對外執行以「新政治思維」爲基礎的對外政策。在對外政策中，逐漸降低意識形態因素，並進行非軍事化政策。結果，美蘇關係逐漸緩和，並在不斷改善之中；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已開始了正常化過程，正在加強合作與增進互信之中；東西歐之間的鐵幕已經撤除，正向「歐洲一家」的理想邁進。冷戰的陰影逐漸消失。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在經濟上成爲「四小龍」之一，正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前進。台灣海峽兩岸的緊張關係已開始緩和，兩岸往來已經開始。在對外關係上，李登輝總統強調務實外交。這與蘇聯總統所倡導的新思維在實質意義上完全一致。因此，在國際、區域及兩岸關係的新情勢下，中華民國與蘇聯的關係開始了新的歷程。

進入八十年代後，蘇聯媒體關於台灣的報導與評論逐漸增加，「莫斯科電台」的華語廣播最爲顯著，對中華民國的內政與外交上的重大事件少有遺漏。

莫斯科方面對我國解除戒嚴令一事表示歡迎，但也有批評。一九八七年八月，蘇聯新時代週刊報導說，台灣已經解除戒嚴令，並通過新法律「以創造更民主、更自由、繁榮和進步的社會」。該刊表示，「台北政權的民主化應該受到歡迎」。不過，台灣局勢仍隱藏暗礁：第一，台北仍堅持反共政策；第二，不願與中共對話；第三，在反對派中有台獨主張；第四，分裂主義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②②}

蔣經國總統辭世後，蘇聯方面判斷說，台灣情勢能否穩定而不複雜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華盛頓的立場。莫斯科方面

註②① 真理報 (Pravda)，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頁五。

註②② 新時代，一九八七年七月，期三十一，頁二十七、二十八。

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是雙面的。美國一方面公開表示，反對台灣分裂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對中國的統一不感興趣。蘇聯的官方刊物說，對美國而言，台灣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盟邦，軍國主義的前哨和有利的經濟伙伴。²³

從一九八八年初開始，蘇聯利用各種管道表達，願與中華民國發展經、貿關係。首先藉蘇聯駐東南亞及美國的記者向我國記者及旅行者傳達此一訊息。同時，蘇聯駐美國外貿組織「美蘇股分公司」(AMTOG)的經濟學家弗洛羅夫(S. Frolov)說，在戈巴契夫新的經濟政策下，莫斯科希望對所有國家進行貿易，因此對台灣擴大商務是適當時機。²⁴另外，蘇聯「亞太經濟合作國家委員會」主席普瑞馬可夫(E. Primakov)在一項亞太國際會議上表示，蘇聯有意引進中華民國與南韓的科學技術，協助西伯利亞的開發。²⁵

在蘇聯方面的頻頻表態下，台灣的「蘇聯熱」開始出現。同年八月初，台北的學界與商界聯合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座談會，其主題是「從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展望我國的對蘇貿易」。²⁶這種性質的會議是空前的，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也為「蘇聯熱」加了一點油。十月初，台灣省進出口公會聯合會組織了一個「訪問蘇聯貿易考察團」，前往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明斯克等城市進行考察，團員將近六十名，其中有兩名官員。²⁷

這件事引起中華民國執政黨中央常會的內部辯論，委員之一沈昌煥認為，如此重大之事理應通過中央常會討論後再行決定。他的言論激起學界、輿論界、商界各種不同的反應。多數意見認為，與蘇聯試行建立經、貿聯繫，在當前的條件下，不僅無不當之處，而且為拓展對外經濟關係、分散國際市場的必要作法。在這場辯論中，充分表現了台灣社會的民意傾向：贊成與蘇聯直接貿易。

當時，華盛頓方面以「高度的興趣」注意中蘇關係的發展，但懷疑中華民國與蘇聯交往是否有利可圖。²⁸中共對台北與莫斯科關係的發展未作直接評論，但早已作出分析，預測台灣與蘇聯經貿往來可能有新的發展。²⁹

一方面，台灣的商人與一般民衆開始前往蘇聯考察或觀光；另一方面，蘇聯公民與官員也相繼踏上寶島的領土。例如，一九八九年二月，我國空軍派機，把航行在我國附近的蘇聯貨輪上的一名受傷船員接往台北三軍總醫院急救。三月，准許蘇

註23 新時代，一九八八年二月，期六，頁十五。

註24 英文中國日報，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六日，頁一。

註25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日，頁五。

註26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七日，頁二。

註27 英文中國日報，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十四日，頁二。

註28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十五日，頁三。

註29 瞭望週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五月，期十九，頁二十六。

聯小姐梅霍葉娃 (Y. Mikhayeva) 及愛沙尼亞小姐盧莎爾 (L. Loosaa) 來台參加一九八九年全球小姐選美。這是四十年來，我國政府正式容許蘇聯公民入境，成為熱門新聞實為意料中事。五月，「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 在台北舉行第二十二屆會議，蘇聯代表亞赫瑞曼科 (Y. Akhremenko) 及伊凡諾夫 (V. Ivanov) 獲准入境，前者是「蘇聯亞太經濟合作國家委員會」的執行書記，後者是「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亞太地區研究的負責人。兩者都具有官方身分，因此我國已開創了容許蘇聯官員入境的實例。

五月中旬，中華民國外貿協會組成「蘇聯市場調查團」前往蘇聯訪問三週。這比一九八八年台灣省進出口公會的訪蘇又高了一個層次，其意義自然不同。

一批蘇聯記者在「美國世界媒體協會」的安排與支持下準備於十月中旬來台訪問，行政院新聞局已經批准；但在來台前夕突然通知我方，取銷此行，對方未說明取銷原因。不過，一般判斷，這是蘇聯政府受到中共的壓力，所採取的一項措施。但是，中共從未對此事公開表示意見。十一月中旬，蘇聯公共衛生部國家雷射外科醫學中心主任史寇爾金來台訪問。他相信，蘇聯政府願與台灣當局推動合作，並在政治上有所聯繫；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在謀求與台灣學術交流計畫。³⁰

雙方關係發展的走向

一九九〇年二月，中華民國開放對蘇聯的直接貿易；三月，開放直接郵務，並開始考慮航空問題；四月，准許我國商人在蘇聯及阿爾巴尼亞等國家投資；稍早，對其他東歐國家投資禁令已經解除。³¹這是中華民國與蘇聯新關係的開始。在此之前，雙方僅維持間接貿易關係。一九八七年，中蘇雙邊貿易額為七百五十九萬八千美元；一九八八年，增至三千四百八十萬美元，成長三倍以上；一九八九年升至七千四百八十萬美元，成長一倍多；一九九〇年增長至一億二千萬美元。預計一九九一年我國與蘇聯的貿易額可增至二億多美元。³²在這幾年中，我國對蘇貿易皆為人超。

在一九九〇年中，雙方官方往來已習以為常。據統計，當年蘇聯官方來台洽談的代表團多達十七個。³³茲以幾件較具意義的訪問述評於後。

註30 聯合報，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七日，頁四。

註31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頁二十一。

註32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頁二；大公報，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頁四。

註33 英文中國日報，民國八十年一月八日，頁三。

十月二十七日，蘇聯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新聞報刊稱其為「市長」）卜包夫（G. Popov）抵達台北，進行訪問。這造成了中蘇關係發展中的第一個高潮。卜氏到達台北後，首先赴中華民國外交部，會晤外交部長錢復；接著與副部長章孝嚴晤談。卜氏指出，他希望通過這次訪問，使雙方往來有一個好的開始，並希望著手擬制雙方關係發展的藍圖。從任何角度看，卜氏的訪台皆具備極大象徵與實質意義。他雖然是中興紡織公司的客人，但是他畢竟是蘇聯首都莫斯科市的政治領袖，決非單純的私人訪問可比；而他與台北方面部長級官員會晤，亦非單純的禮貌拜訪。

姑不論美國及南韓方面對此事實的「關切」，³⁴中共方面已作出具體的反應。十一月一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李金華聲明，中共反對任何兩個中國的圖謀；同一天，中共「駐莫斯科大使」于洪亮前往蘇聯外交部，會見蘇聯副外長，就卜波夫訪台之事，表示「嚴重關切」。對於中共的「關切」，蘇共中央與蘇聯外交部作出不同的反應。蘇共中央書記法林，對卜波夫訪台一事持否定態度，認為這完全違反蘇聯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蘇聯外交部則強調，卜氏的活動並不影響蘇聯對台灣的立場；蘇聯始終主張，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蘇聯不會同台灣建立官方聯繫。³⁵

卜波夫離台灣後不久，俄羅斯的採購團接踵而至，採購團由三人組成，由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執行書記伏夏諾夫（R. V. shchanov）率領，自稱握有十億美元的採購預算，在台灣的採購約在一億元左右。³⁶但是，此次採購的結果並不圓滿。十一月下旬，蘇聯「對外經濟協會」會長卜克洛夫斯基（V. Pokrovsky）抵華訪問。他是應經濟部國貿局邀請而來，可算中華民國官方邀請的第一位蘇聯客人。³⁷他本身身分的「官」與「私」很難分辨。蘇聯「對外經濟協會」隸屬於「蘇聯維護和平委員會」，該委員會多年來為蘇聯對外統戰機構，在東西方和解之前，以宣傳裁軍與銷毀核武為主。目前雖然仍以維護和平為其主要任務，但促進人民對人民外交和對外經濟聯繫已成為其主要工作。以往，這個委員會名義上是非官方機構，但其預算却由政府供給。對外經濟協會係由四十多個企業聯合組成，其主要任務在發展對外經濟活動。卜克洛夫斯基在一次座談中表示，在不違反國際法的原則下，蘇聯願意出售武器軍備給台灣。所謂不違反國際法原則係指不出售核子及化學等武器。他引用蘇聯時下流行的一句話說：「只要能賺錢的，都可以出售。」³⁸

可以理解，進入一九九一年後，雙方往來更加頻繁，所謂「蘇聯熱」並無降溫的傾向。即使八月十九日蘇聯的流產政變

註34 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三十日，頁三。

註35 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七日，頁二；八日，頁一。

註36 經濟日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頁七。

註37 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頁三。

註38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頁四。

也未對這個過程發生負面影響。茲綜論最近發展走向如下。

經貿關係發展順利。目前中蘇貿易總額並不算大，但成長快速，而且是剛剛起步，相互了解不深，不熟悉對方習慣。去年容許與蘇聯直接貿易後，今年中華民國的官方企業已獲准與蘇聯直接貿易。七月，有關單位表示，願意經濟援助蘇聯。外貿協會正準備在莫斯科設立辦事處，今年底或明年初可以開始作業。三家台灣銀行已與蘇聯銀行建立了直接商務聯繫，作為雙方貿易的管道。一般而言，台灣商人對在蘇聯投資的興趣很高。目前，雖然尚未達成實際協議，但不少代表團已計畫於近期內訪蘇，探討投資前景。中國石油公司已一改以往的保守態度，考慮與蘇聯一些石油公司聯合鑽探西伯利亞石油的可能性。

林業與漁業合作已達成初步具體協議。今年七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處負責人率團訪蘇，雙方協議成立林業工作小組，推動林業合作、投資設廠及木材貿易等業務。³⁹九月，蘇聯林業代表團抵台，研商林業合作，達成初步交易。一旦達成協議，將是兩國間首宗「以物易物」方式的木材交易。⁴⁰八月中旬，中蘇漁業諮商首次舉行，獲致積極成效。雙方同意，建立魷魚捕撈合作關係，秋刀魚和鱈魚則以合資經營方式進行；蘇方亦同意建立直接管道，以處理我方遭扣押漁船的營救問題。同時，蘇方願意在台灣建造及修護漁船。關於此點，待政府當局核定之後才能決定。⁴¹

科技文化交流已經開始。科技文化交流將是中蘇關係中的主要項目之一，其重要性僅次於經貿關係。我國國科會官員表示，蘇聯的航太、生物等科技相當先進，國內未來可先從蘇聯引進這方面的科技。今年五月，國科會首次邀請蘇聯科學院院士、數學教授安托諾夫斯基及蘇聯國家物理技術研究所所長亞爾辛來訪。這是中蘇科技交流踏出的第一步。六月中旬，蘇聯研究船「維諾格拉道夫」號抵高雄港，該船屬蘇聯科學院。該研究船的來訪，促進了中蘇兩國科學研究的進一步合作；船上的科學家對我國核能發展頗有興趣。我國國科會主委夏漢民表示，將進一步了解雙方合作的可能性。⁴²此外，蘇聯漢學家的來訪，蘇聯俄語教師的聘用，我國學者赴蘇出席學術座談，暑期學生赴蘇聯莫斯科大學與列寧格勒進修修語等，在在顯示，文化交流正在加速發展中。我國中央圖書館計畫與蘇聯圖書館交換圖書文獻。我國行政院之下的「對蘇工作小組」在其五月中旬的會議中決定，將加強與蘇聯媒體及學術界交流。

雙方力求相互了解。無可諱言，中華民國與蘇聯經過四十年的互不往來，彼此陌生互不了解。因此，雙方學者與新聞工

註39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年七月十一日，頁十一。

註40 聯合報，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一日，頁八。

註41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年八月十八日，頁二。

註42 自由時報，民國八十年五月八日，頁一〇；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年六月十八日，頁十一。

作者皆不遺餘力去了解對方，轉告同胞。我國各媒體記者紛紛深入蘇聯，把蘇聯現況轉告國人，已收到不少效果。蘇聯媒體也在作出相同努力。去年十一月中旬，蘇共首要報紙真理報駐維也納特派員梅爾尼可夫獲准來台訪問。這也是蘇聯真理報記者第一次來台訪問，在他之前，消息報駐東京分社主任亞卡伏諾夫曾來訪，其主旨在瞭解我國政、經現況及人民生活等。不過，他並非第一次來訪的消息報記者。去年四月，消息報駐莫桑別克特派員裴列斯茲金尼曾來台北訪問兩週。兩人採訪後皆曾在消息報發表多篇連載報導。此外，火星週刊總編輯，文學週報國外新聞主編皆曾於今年八月來台。隨著中蘇兩國往來頻繁，雙方新聞工作者與學者的交流勢必不斷增加。

結 論

經過數年的試探與不斷努力，中華民國與蘇聯之間的實質關係已經打下基礎。中華民國政府決定繼續發展這個關係。為此，今年三月，由外交部為主體，在行政院之下，成立了「對蘇工作小組」，而且確定對蘇關係的發展重點在非官方範圍內；也就是以經貿關係為主、科技文化等交流為輔。

就經濟關係而言，雙方經濟合作潛力甚大。第一，雙方產品結構互補性甚高；第二，蘇聯所需日用產品皆台灣亟欲推銷者；第三，蘇聯需要台灣發展經驗，台灣可利用蘇聯的研究潛力，兩者相互結合可產生重大的成果。

目前，與蘇聯發展關係的最大障礙不是經濟的或文化的，而是政治的。第一，蘇聯內部政局不穩。舊聯盟已解體，新聯盟尚未建立，將來的政治體制如何，目前尚難預卜。第二，蘇聯只承認「一個中國」，其首都在北平，而認為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一個省。因此，蘇聯與台灣往來有幾個原則：(一)是地方階層的；(二)是非官方的；(三)在中共容許的範圍內活動。

這些限制如果不突破，現有一切雙方關係的發展皆是有限的。也許，蘇聯最近發生的劇變將會改變莫斯科的基本立場。

*

*

*